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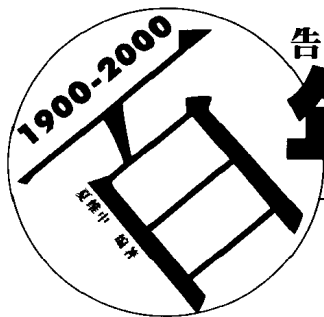


告别二十世纪丛书 江苏美术出版社

# 年商业变迁

本  
家  
買  
美  
貨





告别二十世纪丛书 美术出版社

# 百年商业变迁

2A1 E 0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商业变迁/夏维中编著.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0. 7

(告别 20 世纪丛书)

ISBN 7-5344-1113-0

I. 百... II. 夏... III. 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现代 IV. F7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538 号

## 百年商业变迁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通州市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5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44-1113-0/J·1110

社址/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电话/3303409 邮编/210009

发行科/南京市湖南路 54 号

电话/3211554 邮编/210009

定价:17.00 元

## 目 录

## 第一章 传统与变革

- 一、因买卖而引起的战争 ..... (2)
- 二、朱元璋的想法及传统商业 ..... (6)
- 三、清廷何以不愿与外夷做生意 ..... (15)
- 四、洋务派的工商梦 ..... (23)
- 五、买办发洋财 士绅下商海 ..... (29)
- 六、朝廷以官奖商 ..... (36)
- 七、遍地红顶商人 ..... (41)
- 八、终于有了商会 ..... (46)
- 九、洋货与国货 ..... (49)

## 第二章 剪不断 理还乱

- 一、工商成了重头戏 ..... (66)
- 二、世道变了 ..... (70)
- 三、洋商占尽先机 ..... (75)
- 四、买国货就是爱国 ..... (81)
- 五、商人重塑城市 ..... (86)
- 六、越来越重的市侩气 ..... (92)
- 七、上海商人的力量 ..... (100)
- 八、国家又成了大股东 ..... (105)
- 九、官与商再度联姻 ..... (109)
- 十、城市工商社会的形成 ..... (116)

十一、农民成了商业化的牺牲品 .....	(124)
十二、日寇的蹂躏和掠夺 .....	(128)
十三、战时经济体系下的计划经济 .....	(133)
十四、大崩溃 .....	(137)

### 第三章 工商食官

一、社会主义工商纲领 .....	(144)
二、工商政策的前后演变 .....	(146)
三、打击不法商人 .....	(149)
四、逐步消灭私商 .....	(152)
五、“六〇年”前后 .....	(157)
六、对市场不得已的让步 .....	(161)
七、政治化商业及票证时代 .....	(163)
八、抑商思潮 .....	(171)
九、官商体系 .....	(178)
十、历史因果 .....	(187)

### 第四章 百年轮回

一、物极必反 .....	(190)
二、意识形态的变化 .....	(192)
三、姓“资”还是姓“社” .....	(196)
四、赚外国人的钱和让外国人赚钱 .....	(201)
五、从买不到东西到卖不掉东西 .....	(207)
六、商业成了魔棒 .....	(213)
七、恭喜发财 .....	(221)
后记及主要参考书目 .....	(227)

## 第一章 传统与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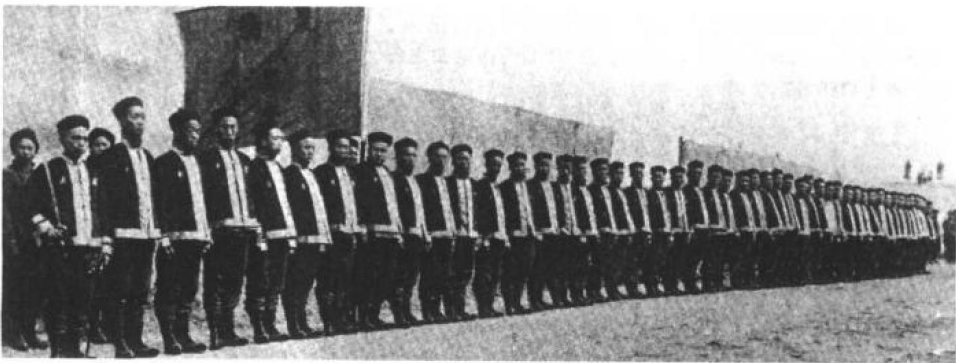
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该是中国商业史上值得注目的一年。因为就是在这年,清廷接受大侨商张振勋的建议,于六部之外专设商部,并任命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为左右侍郎,张謇为头等顾问官,以指导全国的工商事务。

这不仅是大清朝破天荒的大事,而且也是千余年来的头一回。自古以来,农本商末是历朝必行的治国之策,而上农工商依次排列也是铁定的名分,何以到了世纪之初,却祭出了这等非常之举?

其实,非常之举又何止设立商部!在光绪皇帝硃批设立商部的敕令中,就有这样一段以前所有的皇帝都不可能说得出来的惊人之语:

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有厚望焉。

堂堂一国之君,却一反千年古训,竟把商务振兴提高到“阜民财而培邦本”之绝对地位,可见商务在其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更有甚者,在不久商部陆续出台的奖励章程中规定,凡对工商发展有巨大贡献者,朝廷不惜以男、子等爵位奖赏。这是何等荣耀!想当初,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都是以百战之功、力挽狂澜才获得如此之



1906年,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设立。图为农务大学堂学员列队迎接慈禧巡视。

封的。

不过,清廷如此之举,却是被一步一步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世纪之初清廷所极力提倡的那些举措,包括振兴工商在内,也正是它长期以来所极力抵制的。几十年来,清廷在内乱外侮的强压下,极不情愿地一点点退让,不断放弃固有的准则,同时又极不情愿地一点点接受变化。而至世纪之初,它却突然发现已到了无处可退的地步,非大变不足以求生存的危局也已形成,因此才会有这一系列所谓的新政出



1901年京奉铁路北京至马家堡段完工。图为进入北京的第一条铁路(京奉铁路)通过哈德门(今崇文门)的情景。

台。

这些新政,对于挽救大清朝,显然是为时已晚了。不过,对于20世纪文化之演变,却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风气之先。细观20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商业文化之变迁,追根寻源,又何尝离得开世纪之初早已埋下的那些因果呢!



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为改变风气,振兴产业,1910年在江宁(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开国内博览会之先河。图为劝业会农产馆。

## 一、因买卖而引起的战争

大清朝在世纪之初的非常之举,实在是被逼出来的。弄到这种地步,也确实是万般无奈。

最早令朝廷下不了台的,还是那场后来被称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1888年的南京评事街 从画面中似乎还看不出传统商业有什么大变化。

的军事冲突。道光二十九年(1839),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严禁鸦片,结果导致了中英军事冲突,长达3年之久,最终以《南京条约》之签订而收场。

虽然后来把这次战争渲染得家喻户晓,但在当时,许多人并未受到震撼,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次战争对大清朝以至于整个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清廷上下的绝大多数人依然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看待此事的,因此当有人把这次战争的经过写成书后仍轻巧地名之为《道光洋艘征抚记》时,大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种看法,部分是因为对当时世界的无知。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在战争中代替两江总督伊里布与英军交涉的张喜,在惊叹西方技术的同时,而更多的则是问一些好奇的问题,诸如:英国女王果真是女人?多大年纪?何时接



位?有丈夫吗?将来要传位何人?鸦片产于何处?英国田土种什么植物?英国在中国何方?等等。担任交涉的官员尚是如此,一般人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也难怪道光帝直到《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后,还不太相信美国确有其国,而要大臣查询。因此可以说,清廷与英国人打了3年糊涂仗,并且在打完以后,还是不太清楚。

当时的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严重性,即大清帝国这次遇到的“英吉利”绝非一般夷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正是在这个大英帝国的领导和影响下,欧洲和北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创造着与农业文明有着天壤之别的工业文明,并一跃而成为世界列强。直到多少年后,人类才给这种新的文明起了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名称,即资本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人或许会认为这是个小儿科式的提问。而实际上这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也绝非易事。依黄仁宇先生的研究,资本主义则可这样来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则必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因此,只要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那么,资本家就成为国家



1888年的南京夫子庙,其商业景象依旧是老样子。

之主人，一切皆以他们为本位。资本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并以法律规定及其严酷执行来予以保证，于是乎资本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罪恶活动便在国内外被冠冕堂皇地广泛进行。暴力、征服、奴役等等那些人间劣行，被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优势力量，而更显彰著。对外扩张，增强国际贸易，开拓殖民地，追求商业利润则成为这些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

说到底，在与大清帝国公开对抗之时，英国已具备了绝对的把握。贸易上的争端仅是表面现象，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要大清帝国屈服并接受它的那套游戏规则，在极不公平的前提下被纳入其经济系统。而且依英国人当时的想法，他们的做法是天经地义的、合情合法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事实上他们在世界各地也这样做了几百年，而且屡试不爽。像今天天人共愤的鸦片贸易，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当的贸易，应受保护，而中国人禁止鸦片理应受到惩罚！这就是当时西方的逻辑。

然而，大清国的那些主宰者却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些。在他们看来，英夷此举仍是为了贸易，为了获利。后人或许会感到不解：堂堂的大清国，何以不敢与那些洋夷做生意？！要回答这个问题，则说来话长。

平心而论，中国人做生意的能力和历史，可以说与任何民族相比也毫不逊色。即使像马克斯·韦伯这样认为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甚至承认如果以商业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早就有商业资本主义了。但问题在于，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商业，无论是从那方面来看，都有自身强烈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与西方列强当时所提倡的商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

中国商业的发展史，大概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与其他文明的商业发展史很不一样，因此也很难作横向比较，更无法用所谓的“普遍规律”来套用。究其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但主要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分不开的。

一般而言，历史学家把西周以降至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称之为封

建社会。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历史，并且是从日文中转用过来的。现在看来，这个概念并不十分贴切，甚至在许多方面混淆了中西历史概念各自依据的内容。例如，一般而论，封建之下的土地，无论中西，大概都是不能流动的，更不能买卖，但在中国却早在先秦就承认土地私有。而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大宗财富的土地，一旦能进行流通，则其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就无法低估，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了文明发展的走向。仅此一例，即可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而在这种独特性之下，中国的商业文化传统也有其自身的鲜明性格。

之所以要强调中国商业传统的独特性，并非因为其他，而是要说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中国商业文化在自西风冲击以来的百余年中，其改造及重建之所以要历经如此众多的困境、要重复如此多的惨痛轮回，而且时至今日仍需付出无法预计的努力和牺牲，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则是中国原有的强大商业文化传统，以及其赖以长期生存的历史氛围。

那么，拥有其他文明无法类比的悠久历史的中国商业及其成熟的商业文化，何以在近代却反而成了中国商业及其文化改造、重建的负面因素？道理很简单，外来的东西遇到了本土传统的强大抵抗，不仅引起困难，更严重的是，在整合过程中又时时发生异化。犹如在一张已有浓烈底图的纸上去临一幅新画，肯定难有与旧作相同之效果一样。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但也未必不会弄到玉石不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糟糕结局，甚至走上玉石俱焚之后又重新来过的道路！

那么，传统的中国商业及其文化到底又是何种面目呢？

## 二、朱元璋的想法及传统商业

自先秦以降而至明清，中国的商业一直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演变。其中虽有曲折、停顿甚至倒退，但总的来说，仍是一波高过一波，不断向更高的水平推进。自明中期开始，传统的商业进入了急速发展的

阶段,其势头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其水平也达到传统商业的最高峰。因此,以明清商业作为传统商业之写照,大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要想了解明中期以来商业发展的盛况,就必须先看看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初的经济政策。对“朱元璋模式”的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传统商业史的了解,更有利于我们弄清在朱元璋之后其幽灵是何以时隐时现,甚至在某些时候带上时髦的面具而死而复活的原因。

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村最底层杀上皇帝宝座的农民皇帝,从登基伊始就依凭其强大的中央强权,推行其经济政策。简单地说,朱元璋的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形式如工商业、金融业、交通业等,也无意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增强全国财富,促进分工合作的发展,刺激私有经济的勃兴,而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落后的小农经济,采取各种措施打击民间私人财富的扩张,抑制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随意剥夺私有财产,从而以平衡的姿态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和王朝的安全。

朱元璋的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扼制了商业的发展。依朱元璋的想法,天下臣民,应以士农工商军等职业,各安其分。其中农业及农民是其关注的重点,其政策也体现了典型的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特点。朱元璋以超经济的强权,大肆打击农村豪富,把大量土地掌握于国家手中。如在当时最发达的苏州府和松江府,官田比例都高达60%~70%。其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朝廷要最大限度地控制民众及耕地。而在朝廷控制下的农民,被强制编入里甲,不得随意流动。他们在耕作之余,要以收获物交纳赋税,以力役去承担徭役,自给自足,不须与外界有什么交换。

这种经济政策,实在缺乏眼光,毫无想像力,一味节省,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当中因素容易脱落,并且只注



明太祖朱元璋像。朱元璋虽已死了600年,不过他的思想却很有生命力。

重原始型的生产,忽视甚至抑制行销间可能的技术增进。说穿了,这种政策就是为了维护农村社会的简朴风气和表面上的平均主义,防止社会分化和多元化,从而达到稳定的目的。

与这种重农政策相配合,朱元璋严厉实行抑制工商业的政策。所有的重要手工业都被编入官营体系,用强制手段把天下工匠编成匠籍,让其接受超经济的剥削,无偿为朝廷服务。而对商业,朱元璋更是深恶痛绝,并视之为威胁其统治根本之大敌,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击、抑制。金银被禁止使用,重要的商业由国家专营,大宗的产品如农产品、手工业品被最大限度地排斥到市场之外等等。商业的主角——商人,也受到了空前的贬低、打击:其地位居四民之末,不准穿绸缎绢帛,不许坐轿,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等等,俨然是政治上的贱民。

在这种抑商的氛围中,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低潮,甚至是倒退,市场一片萧条,社会沉闷窒息。这也正是朱元璋所追求的。在他看来,简单、俭朴、均平、安定,各安其分,等级有序的社会,正是他给天下臣民所带来的浩荡皇恩。殊不知,他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同时也带来了贫困、落后、停滞、绝望,甚至是更残酷的不平等。当然,朱元璋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且能这样做,除了因为他底层生活的经历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及其所依凭的社会经济结构。

不过,到明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朱元璋在明初确立的那一套经济政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改革也被迫一步步地进行。顺便提一句,纵观中国历史,举凡重大改革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真正能高屋建瓴、预先筹划、牺牲自己利益的改革者,虽不能说没有,但也确实很少。而且真正推动改革的,也是底层百姓和下级官吏。明中期以来的改革,正是这种情形。

那么,明中期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变化当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农产品及农村手工业品被越来越多地抛进了流通,进入了市场。像粮食、棉花及其手工业品等,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大部分被以地租和税粮的形式周转,而是通过市场流通。用文雅一点的话说,就是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在不断地提高。农民或地

主出售农产品,换取货币后再来交纳赋税,购入自己所需的物品。农业在当时是第一产业,其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同时也迫使朝廷改变原先的赋役政策。

当然,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有曲折的。但总的来说,从15世纪至18世纪即从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中,改革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压力之下一直在进行,而商业也由此而不断得到进步。

到乾隆时代,农业赋税除少部分特供外,都以货币形式征收。人头税(即原先力役的货币转换)已基本被摊入土地。官营手工业基本崩溃,民营手工业已是绝对主角。除少数特定物品如盐之类仍由国家垄断外,商业已基本上放开。可以说,此时商业化程度已达到了传统中国的最高水平。

人口最为众多的农民,被抛入商业的潮流中,他们终年辛勤的劳动所得,像农产品、手工业品,除自用之外,绝大多数被送到市场,换取货币,以应付各种开销。而其他阶层,也都无一例外地被抛入商业大潮。市场网络已基本形成。从乡村集市到中心城市,其商业功能愈来愈

强。商路不断增多,长江、大运河等干道日益繁忙,水陆码头,摩肩接踵。从商风气也日益浓烈,社会观念明显变化……而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商人集团的变化,以及社会对商人或商业态度的改变。

商人队伍在不断壮大。在朱元璋时代,从商的人数被严格控制,社会成员对从商也没有多大热情。不过到了明中期以后,风气开始发生急剧变化,经商人数明显增长。弃农经商、弃文从商的情形已是见怪不怪。商人集团的力量迅速壮大,大贾豪商,行商坐贾,贩夫走卒等等,活跃在大江南



山西当铺的招牌。



山西大德通票号的招牌

北,组成了一道前所未有的社会风景线。

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商帮。像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洞庭商人、宁波商人等,都是著名的大商帮。每个商帮都在全国各地广建会馆、公所,作为他们在异乡联络、经营之用。他们各自控制着自己的优势行业,或盐业、棉布、粮食,或当铺、票号、钱庄等等,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行业,甚至被某些商帮所垄断,如当铺则必归徽商,票号则必归晋商,钱庄则必归宁波商人等。

商人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原先的商人,绝大部分是由社会底层成员组成。但明中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原先不屑从商之人,也开始染指商业。尤其是处于社会上层的读书人,开始有人向商业转向。而这些人加入,又改变了商人的整体面貌。于是,商人在孜孜求利的同时,也慢慢地文雅起来了。读书、编书,满口的仁义道德、诚信勤俭之类,也成了许多上流商人常玩的风雅。商人们在供奉赵公元帅的同时,也开始



正乙祠戏楼建于1667年,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戏楼。该楼位于北京前门外的银号会馆内。会馆由旅京宁波钱商所建,因供奉正乙玄坛老祖(财神赵公明)而名正乙祠。



此图为河南版画,上为关羽,下为财神。关公重义气、守信用,商人供奉他,便是想表明自己不仅求利,也讲仁义。

供奉起关老爷，就连杀猪卖肉的，也要供奉猛张飞，意思是表明商人不仅求利，也讲仁义。事实上，明清的商人也乐于做些善事，小到修桥铺路，助残济孤，大到捐助军国大事等等，对社会的参与和影响越来越大。

社会各界对商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社会的精英阶层即读书做官的那些人，慢慢地改变原来的偏见。在这些人眼里，商人原本是“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阶层，说白了就是重利轻义之徒。但到了明中期以后，他们对商人、商业的看法就开始变化了，也渐渐地帮商人说起好话来。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儒，也甚至说出了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之类的话，并把商业提高到士农工相同的地位，说什么“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四民异业而同道！”与商人交往，替商人说话，甚至自己或子弟直接去经商等等，对明中期以来的士大夫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而对于一般百姓来说，经商也不再是什么丢脸的生计，只要能赚到钱，养家糊口，便是好营生。像山西等地区，甚至视经商为谋生之上选，最聪明人往往被送去学生意，而笨迂之徒才去念书。这种风气在清代也无丝毫改变，后来甚至传到了雍正皇帝耳中，气得这位天子连骂可笑！据说山西在清代没能出状元，就跟这种重商轻文的风气有关。（奇怪的是，现在的山西似乎丢掉了祖宗的手艺，变成最不善于经商的省份之一）雍正皇帝虽这样笑骂山西人，其实他何尝不知道，他的父皇康熙皇帝就跟上层商人关系非同一般。康熙皇帝自己曾公开说，他南巡江南没有用公家一分钱。那么钱从哪里来？据他自己讲，是扬州的盐商们自愿孝敬的。康熙南巡不用公帑而由盐商赞助，且他本人还沾沾自喜，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风气。连皇帝尚且如此不遮不掩，其他阶层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对明清商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影响，中外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注，并作出了各种评判。学者们的热情，并不仅仅是来自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来自现实的需要，因为明清时代不仅是历史，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的母体。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历史问题有时实际上就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往往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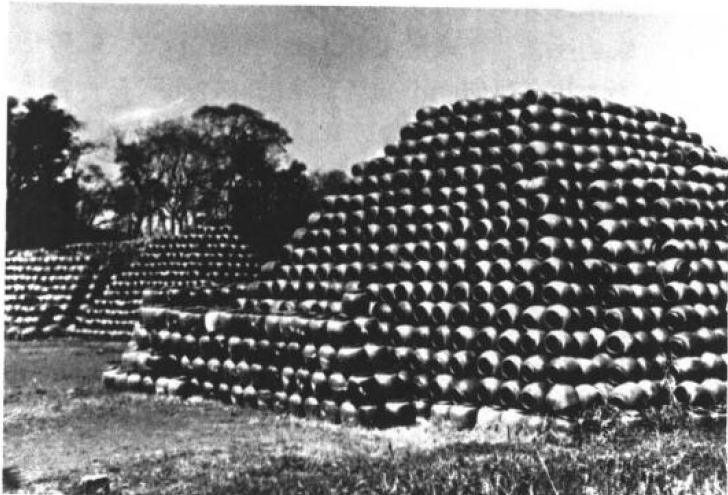
历史问题的延续。

学者们最后的焦点集中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如此发达的中国封建经济何以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来？答案当然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大陆的学者，绝大多数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并坚持明清时代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萌芽之所以没能茁壮成长，除本土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的侵略。不过这种观点近来有所改变，坚持者虽有，但底气已不足，放弃者则更多。而海外的绝大多数学者则一致认为，传统中国绝无可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制度来，言下之意，就是中国要过渡到资本主义，除非有外来因素的介入。两者针锋相对。

平心而论，如果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西欧的历史条件来对照，中国在明清确实难以产生出资本主义来！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它首先是一种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组织体系，一种使全部经济因素能通过市场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的制度。西欧国家都有一个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理方式向以商业为主体的管理方式过渡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文化、宗教、伦理等一系列体现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东西都要脱胎换骨，以适应甚至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中国的明清时代，很难想像会有这样的情形产生。

那么，何以中国的商业就产生不出资本主义来？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商业及其社会基础有自己鲜明的独特性。对其虽很难褒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与能产生资本



明清的商业，始终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这种商业，犹如堆放起来的绍兴酒坛，乍看起来规模很大，实际上却仍是由一户户的小农支撑，很难有本质上的突破。